

古史年代学研究的误区

——夏商周断代工程金文历谱问题分析

张富祥

(山东大学 文史哲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构建金文历谱以推求古史年代的方法,在目前对上古历法不能考明的情况下还不可行。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少量铜器断代所建立的推定西周王年的支点多不可靠,为构建金文历谱所预设的西周历法要点也仍有待证明。工程列为标志性成果之一的共和以下历谱,由于不知共和原不单独纪年,可能问题最多,而由此上推共和以前年代亦必致多误。

关键词: 年代学; 夏商周断代工程; 金文历谱

中图分类号: K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839(2006)02-0064-09

Incorrect Approaches to Studies of the Chronology of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Calendar Chronology of Inscriptions on Bronze

ZHANG Fu-xiang

(Institute of Cul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 R. China)

Abstract: The approach of constructing the calendar chronology of inscriptions on bronze to ascertain the chronology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is still infeasible at present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calendar of ancient times is not clearly known to us. The points d'appui, which have been deduced from the dates of a few bronze-wares and used to deduce the chronology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n the research studies of the Xia-Shang-Zhou Dynasties Division Project, are mostly not well-founded. And the main point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presupposed for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the calendar chronology of inscriptions on bronze still remain to be proved. The calendar chronology that follows Gong He period, listed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outcomes of the Project, probably triggers the most problems for the reason that Gong He is actually not an appellation of king's reign. As a result, the deduction of the chronology prior to Gong He period will definitely be false.

Key words: chronology; the Xia-Shang-Zhou Dynasties Division Project; the calendar chronology of inscriptions on bronze

收稿日期: 2005-11-21

作者简介: 张富祥(1950-),男,山东淄博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学术史。

近年暂时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倡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其中金文历谱的构建和应用占有特殊的地位,工程所拟定的西周王年,事实上大部分是由所作金文历谱推导出来的。但这一方法并不可靠,自工程“阶段成果报告”发表以来已受到不少批评。本文仅就个人学习所得,再就有关问题略作分析和讨论。

制定金文历谱的难度和缺陷,前辈学者早已有中肯的论说。郭沫若先生还在1945年就说过:“彝铭中多年月日的记载,学者们爱用后来的历法所制的长历以事套合,那等于是用着另一种尺度任意地作机械的剪裁。在二三十年以前的旧人仅仅就一二例以作尝试,其结果倒也无足重轻,近一二十年来的新人们更扩大规模作整套的安排,大表长编,相沿成为风习。作俑者自信甚强,门外者徒惊其浩瀚,其实那完全是徒劳之举。周室帝王在位年代每无定说,当时所用历法至今尚待考明,断无理由可以随便套合。”^[1](第581页)]又说:“像这样的年代考定实在比原来没有经过考定的更加浑沌。没有经过考定,我们仅是不知道年代而已,而经过所谓考定,我们所得到的却是错误的年代。故用错误的方法从事考定,愈考定,愈增加问题的浑沌。”^[1](第583页)]差不多在同时,陈梦家先生也指出:“西周之历法,今尚不能推求其详。用后世某一种历法根据某虚拟之起点试谱西周年历,更取某组史料之历日谱入之,其事非不可能,而不可据此认为推定正确。”^[2](第500页)]后来又说:“这种推算,首先要以为(一)西周各王年数是可以拟定的,(二)西周历法是可以知道的,(三)西周金文中的月象的解释是正确的。对于上三事,到现在为止,都不能确定。在年代学、古历学未能明确以前,安排的年谱一定是有问题的。”^[3](第408页)]岑仲勉先生也曾谈到:“无论何家,于现时而欲安排一周初历谱,纵非绝不可能,要属来得太早,此则鲁实先氏所谓共和前年数,史记未明,古历疏阔,难以逆推,……今不必侈言上古,试就唐观之,则天光宅元强进正月癸未为甲申,圣历元强易甲午朔为甲子,永昌元仅十一月,久视元乃十五日,其它与推步相差之处,更仆难数。……中古如此,上古可知,试问吾人有何术以推求其如何疏误耶?”^[4](第131页)]

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前辈大家之言,只是想表明,现时金文资料之丰虽非昔比,而仅就金文历日试谱西周年历也还是不到时候(或者今后还会长久地不到时候)。“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章学诚语),其间变量多多,除非有密集而连续不断的金文资料,且断代无误,何敢轻言所谱可信!因此工程所作历谱虽称“以严格的考古类型学方法”排定,也还是不能自圆。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下简称《报告》)所说,工程制定的历谱利用了“66条年、月、纪时语、日干支确定的文献和金文材料”,但因“对西周历法的若干细节目前尚有未能掌握之处”,所以还“只能是一个王年表”^[5](第29页)]。《报告》自谓66条资料中有3条不合,然已有全程参加工程历法小组研究工作的专家指出,其中离谱及勉强不离谱之器仍多达十余件,“与前此出现的诸种历谱不相伯仲,至多是五十步百步之别”;同时又批评说:“《报告》所拟定的这个‘金文历谱’,是主观的产物,凡与其观念不合的资料都遭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已超出学术研究水平高低的范围,而是学风不诚实的表现。”^[6](第137页)]另有学者经过专门的审查,缕举十余例,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报告》所录历谱存在的失月、不合历、置闰过多、失闰过多等情况^[7](第106-116页)],言之凿凿,无可辩驳。这样的历谱,即使仅作为“王年表”来看待也是不行的,因为历谱不准则铜器断代失据,铜器断代失据则历谱不准,二者交互影响,“王年”又何从谈起!2003年陕西眉县新出土的铜器群,其铭文已与工程称为“标志性成果”之一的共和以下历谱发生冲突,此尤为历谱不可靠的新证据。

陈梦家先生说过:“西周历之重谱,须先探寻西周历法及西周年代,此二事金文材料或有所贡献也。”^[2](第500页)]但现在历法既不明,年代亦不知,而硬以并不自信的历谱求年代,实属勉为其难。工程的铜器断代研究是下过大功夫的,而且对权威专家的意见多有吸取,排谱的手段当然也未尝不可用。然而这种专门而艰深的学问一旦用于具体的求年过程,往往亦因年代错位而捉襟见肘。例如工程列为推定西周王年七个支点的第一个——吴虎鼎,其铭文有云:“惟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道入右吴虎,王命善夫丰生、司空雍毅,申刺王命。……”《报告》解释说:

“夷宫”为夷王庙,“刺王”即厉王,可知此器作于宣王(时)，“惟十有八年”即宣王十八年(公元前810年)。该年十二月丁丑朔,丙戌为初十,与既生霸相合。此器与其它青铜器联系,可作为西周晚期年代的一个重要支点,证明《史记》的纪年可信。^[5](第22页)]

上引周言先生文已对此提出反驳:“且不说此论成立与否取决于许多假设——唐兰先生‘康宫说’正确、断代工程月相说可靠、其余铜器断代全部准确,即便‘夷宫’确为夷王死后所建之庙,也只能认定此器作于夷王之后,可厉可宣,因为‘申刺王命’并不等于刺(厉)王已故。……若吴虎鼎是宣王器,那么……铭文中这



次‘付吴虎疆’的命令也最少在33年以后才重申,效率如此低下似乎可能性不大。”^[7](第120页)按说此器定为厉王十八年之物是很合适的,大约因其纪日干支与工程的排谱不合,工程遂定为宣王时物。然工程所定厉王年代实不可据。据我们考证,共和期间的王室纪年仍用厉王之名,并未废止,近年出土的陕西眉县铜器也反映出共和不单独纪年。所以史籍所记的厉王在位37年,应包括共和的14年在内,而不是二数前后相接。由此上推,以后世所称的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为基准,并以夷王在位8年(见今本《竹书纪年》)计,可知夷王元年为公元前872年,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64年,即厉王实际在位23年。这一结果与《史记》的卫、齐、陈诸《世家》所见的年代均相合,而由今本《竹书纪年》推校古本《竹书纪年》的原载亦可得出这一结果^[8]。如此则工程所定厉王年代实超越共和而提前了14年,故所作西周晚期金文历谱亦决不可能与实际年历相合。可见铜器断代不准,用历谱验证年年的工作便全归于无用,因为纪日干支符号只有60个,要在错误的年代中找出合谱的干支并不困难。《报告》称吴虎鼎“可作为西周晚期年代的一个重要支点,证明《史记》的纪年可信”,但《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在位37年而不包括共和的14年本属误记,工程的推求如果是要证明这一记载则是以误证误,反与《史记》卫、齐、陈诸《世家》的真实年代记录全不相合。

厉王的年代下移,可使历来令专家头疼的一些高纪年铜器排入,有的可能虽不用共和年号,而实出于共和年间。不过共和前后各诸侯国的纪年可能是复杂多变的,并无统一的纪年法。工程列为推定西周王年第二个支点的晋侯苏钟,铭文称“惟王三十又三年”,《报告》定为厉王三十三年之物,且对晋侯墓地的木炭样品及祭牲样品作了常规法¹⁴C测定和AMS法测年;然又无法解释其铭文何以称为“晋侯苏”——《史记·晋世家》明载晋献侯籍(即苏)即位于周宣王六年(前822),在位11年而卒,此与考古测年结果亦相吻合,当然与厉王纪年全无涉。李学勤先生的解决方案是将铭文中所记事上推到晋献侯祖父时,即晋靖侯十三年(前846),亦即工程所定的周厉王三十三年,以为“铭文的晋侯苏系他即位后追称”;又说:“猜想编钟的一部分原是他随厉王作战的胜利品,因此将之配成全套,作为纪念。俘获的钟不会有铸好的文字,于是加以镌刻,称号也依刻字时的身分改变”。^[9](第10页)这个解释是很困难的:器物既是铭记战功的,何以铭文要刻于二十多年后?而且当时无制作,又置时王的奖赏于何地?如果把此器的时代退到共和十年(前832),即真实的厉王三十三年,或者会处理好一些,但问题依然如故。据今本《纪年》:

(宣王)六年,召穆公帅师伐淮夷。

王帅师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

王归自伐徐,锡召穆公命。……

七年,王锡申伯命。

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齐。……

九年,王会诸侯于东都,遂狩于甫。

想来晋侯苏钟所铭记的必是此时事,宣王六年(前822)正当晋献侯元年,故铭文谓“王亲遯省东国、南国”,而晋侯苏奉命分兵攻略今鲁西南东平、汶上、郛城一带,距当时徐淮夷亦不远。铭文中右苏受赏的司空扬父,与见于《纪年》的太师皇父、司马休父亦一时之三公。《诗·大雅·常武》无疑是当时史诗,故可与《纪年》及晋侯苏钟铭文对看。惟是铭文中的“三十三年”仍然令人费解。如果确定晋侯苏钟为宣王六年之物,则上溯33年为公元前854年,即下推14年之后的厉王十一年。一种可能的推测是,晋人的记录用的是宣王的年龄,而不是后人所理解的宣王的纪年。假定宣王生于厉王十一年(是年厉王22岁^[8]),则下推33年即宣王六年。也就是说,晋献侯元年相当于宣王六年,时宣王33岁,故苏钟铭文称“惟王三十又三年”。此说尚不能成为定论,但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贸然把晋侯苏钟作为推求西周王年的支点是没有道理可言的。总的看来,共和前后纪年的混乱皆由厉王在位年数的错位造成,工程既不知此,而又将所作共和以下历谱列为标志性成果之一,实际这部分历谱可能问题最多。

其它几个支点,如虎簋盖与穆王三十年、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静方鼎与古本《竹书纪年》昭王之年,可能接近或符合史实,但历谱验证也无多大说服力,因为历谱本身并不令人放心。还有一个支点是《召诰》、《毕命》历日与成、康之年,这点后面再谈。只有“天再旦”与懿王元年,我们认为真正可以作为推定西周王年的支点。工程据古本《竹书纪年》“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可靠记录(今本同),用天文方法推定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我们由今本《竹书纪年》推校古本《竹书纪年》原载的年代亦得到这一结果^[8]。

工程金文历谱的构建以预设的西周历法要点为基础。《报告》载这类要点有四:

1) 西周历法采用“朔”或“朏”为月首。“朔”始见于《诗·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其运用当更早于此。认识朔以前，当以“朏”为月首，朏指新月初见，一般在初二、初三。

2) 西周历法的岁首多为建子、建丑。建子指岁首在冬至所在之月，建丑在其次月。

3) 西周历法一般采用年终置闰。

4) 西周改元的方法有两种：逾年改元——即新王即位的次年改称新王元年，当年改元——即新王即位的当年改称新王元年。^{[5] (第19页)}

这些预设，只是“根据对《春秋》和《左传》中数百条天文历法资料的研究以及对西周有关文献的分析”而“推知”的，恐怕连作者自己也不敢有十分的自信。

月首问题，首先是西周有无“朔”的概念，尚存疑问。即使肯定西周时已有“朔”的概念，那么“朏”和“朔”的转换在何时，当时能否认识“平朔”与“实朔”的区别，也都需要有确实的考求及充分的说明材料。工程构建金文历谱，事实上是以如下预设为前提的，即西周所实行的历法皆以平朔为月首，大月全为30日，小月全为29日。但是“朔”的测定对于古人是不容易的，如果以“朏”为月首，便可能会出现至少31日的大月^{[10] (第48页)}。这一问题是和对月相词语的解释牵连在一起的，而后者至今无定解，既不能在短期内达成共识，则工程的归纳和运用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举。进而言之，西周初年的月历是否即是严整的大月30日、小月29日的朔望月体制，也未见必然。过去刘朝阳等先生曾主张商代历法实行的是“一甲十癸”之制，即一年通常有360日，平分为12个月，每月三旬，每旬皆始于甲日而终于癸日；没有固定的闰月，但有时因特种关系而附加10日或30日。^[11]自胡厚宣先生对此提出反驳之后^{[12] (第262-264页)}，学者即多不之信。然而商末连续八九个月的征夷方历日，甲骨文的记载历历可见，仅按现有的认识，实际上非用“一甲十癸”之说便不能排顺。肖良琮先生曾将“宾组互相衔接的卜旬卜辞加以排比，发现殷历可以连续10个月以上每月都是30天”，并说“这种记时制度相当古老”。^{[13] (第66页)}李学勤先生也怀疑：“是否商代在一定情况下，真的实行过‘一甲十癸’的‘历法’？特别是在像征夷方的战争中，为了便易，暂时用了这种简单的‘历法’？”^{[9] (第249页)}其实这种“历法”未必简单。商代历法应该前后有变动，例如武丁卜辞中多有“十三月”的记录，祖庚、祖甲以后却不见再有“十二月”^{[14] (第220页)}，可能即与历法体制的变动有关，不一定是由年中置闰所致；或者如刘朝阳先生所说，商代干支纪日与实用的四季记时原是两个系统，二者之间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我们甚至怀疑商末历法曾迁就周祭，实行过平均每年365—366日的纯阳历，有如古代埃及的太阳历。据卜辞材料，商人若果曾实行此种阳历，其历月安排既有可能是每月30日而积两年加一句^①，也有可能是大月31日、小月30日相间的；若是相间之法，则有可能是隔月加一日，且31日之月的最后一天与下月第一天用同一甲日干支。商末征夷方历日，有相邻两月同有甲午日的，即可用此法解释，且不须置闰月。其情况如下表^②：

十祀	九月	甲午 [癸卯] [癸丑] 癸亥
	十月	[甲子] 癸酉 [癸未] 癸巳 甲午
	十一月	[甲午] 癸卯 癸丑

① 陈梦家先生认为殷历年可能在360—370之间，见上引《殷虚卜辞综述》，第223页。许进雄、常玉芝先生认为商末周祭有三十六旬型周期和三十七旬型周期，且两种类型的周期基本上是交替安排的，见上引常玉芝文，第50页。

② 表中日干支采自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301—304页。其中带中括号者为卜辞所无，据干支表补。此表逢双月为大月。

		癸亥
	十二月	[甲子]
		癸酉
		癸未
		癸巳
		甲午
十一祀	正月	[甲午]
		癸卯
		癸丑
		癸亥
	二月	[甲子]
		癸酉
		癸未
		癸巳
		甲午
	三月	[甲午]
		[癸卯]
		癸丑
		[癸亥]
	四月	[甲子]
		癸酉
		[癸未]
		[癸巳]
		[甲午?]
	五月	[甲午]
		癸卯
		癸丑
		[癸亥]

据此表,这次商王征夷方,自十祀九月甲午至次年五月癸丑,实有 264 日,而不是 260 日。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说,而如果能够成立的话,那就未必不可推测周初也可能曾采取每月 30 日之制。周初铜器铭文,如著名的利簋、天亡簋、何尊等,均不见有月相纪时词语,或由此故。

岁首问题,争议亦多。自来学者大都深信“三正”之说,然如清人陈厚耀《春秋长历》卷七所说:“考之往古,《诗》、《书》皆用夏正,其以建子为月正者,实始于东迁后时王之制,非文武之制也”。这虽然未必就是定论,却是值得重视的看法。更为现实的反证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对“殷正建丑”提出了质疑,因有殷正建辰、建巳、建午、建未、建申、建酉、建戌之说。^{[10](第50页)} 见解如此歧互,则预设西周“多为建子、建丑”亦不能涵盖完全;甚或以为同一王的纪年一时建子,一时又建丑,尤须慎重考虑,决未可轻断。岑仲勉先生说:“周人建子,当由周、商异族周人守其故俗而然。”^{[4](第142页)} 此甚有理,然亦难说周人固有之历不论何时都与商历不相近。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先生批评工程“历不考虑三正之外”,强调要重视对上古“火历”的研究。^{[15](第96-97页)} 工程天文专家亦深知这一课题的重要,而没有展开讨论,因此相关研究仍以“三正”为前提。

闰月问题,工程忽视甲骨文、金文中并非仅见的“十四月”显然是不妥当的^①。据现有认识,古人于年

① 商代“十四月”的记录,上引常玉芝文提到 3 条,分见《甲骨文合集》21897、22847 及《殷周金文集成》4138;西周“十四月”的记录,上引何炳棣、刘雨文亦提到 3 条,分见近年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出土的叔矢方鼎铭文及《殷周金文集成》3858、3753。



终置闰而称“十三月”，“十四月”当由失闰所致，属于补闰的性质。不考虑这种补闰的情况，金文历谱的编制也将导致失闰或误置闰，而使古代历法的真实情况更其茫昧。此外，商代及西周是否曾于年中置闰，各家意见也不一致。

改元问题，似乎与历法关系不大，而与王年联系甚切。中国古代逾年改元是通例，工程为迁就历谱，特设共王元年与共和元年为当年改元，而又未作举证。上已指出，共和原不单独纪年，故亦不存在改元问题；而据我们所考，史籍记载穆王在位55年亦不可据，穆王实际在位年数当为39年^[8]，故共王当年改元之说亦不能成立。

归根结底，后人对商、周历法的实际状况与基本规则已难以搞清，至今更觉有许多隔膜，又不仅在“若干细节”不能掌握而已。年、月、月相、日期的理解和编排固成问题，就连最基本的干支纪日法也并非不存在任何疑问。研究中国古史年代的学者向来有一个自觉不自觉的假设，就是不管古人用什么样的历法，也不管历法怎么变化，纪日干支都是一例连续排比下来的，从上古到今天既无调整也无间断。李学勤先生说：“如果离开这一假设，也无法谈中国的天文历法推算了。如……甲骨文日月食的惟一解，尽管不是这一假设的充足证明，仍能使我们相信纪日干支的连续能够上溯到武丁这样早的时期。”^[9]（第268页）可是成家彻郎先生却不承认这一“所有的中国人都将之作为不言自明的事实”，认为“在充分的可能性上周族使用的是独自の干支”。^[15]（第98页）这点似乎无关乎历法体制，然一旦涉及历日表，就会成为关系全局的大事项。有些看上去似乎非改动不可的日干支，可能就由此种原因造成，而我们并不知道各自日干支系统的差异。蒋祖棣先生还有更深刻的提问：古代历法研究和天文研究应该以“科学”为目的，还是以“历史”为目的？“如果以‘科学’为目的，张培瑜先生的成果（《中国先秦史历表》）可以成为定论。可是周代历法的实际情况仍然不清楚。如果以‘历史’为目的，就应该对周代畴人（准确地说是周代不同集团的畴人）的纪日规则加以研究。如果对当时的纪日规则没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用‘科学’的历表代替周代畴人的规则，或用一种规则去概括当时并行的不同规则，就会曲解周代天文和纪日行为的实际情况，并且增添在周代纪日资料认识上的混乱。”所以，对纪日金文也不能仅用一种历法作规范，“由于青铜器在来源上多元化，纪日金文所代表的地域性十分明显，纪日金文背后的历法制度更有可能不一致”，这就需要“对纪日金文历法背景进行逐一的和通盘的整理”^[16]（第90、92页）。仅靠约60件铜器的铭文制定历谱，用以套合西周王年，即使偶然有默契，也不能证明此种方法在现时即可取。要使此种方法成立，还有数不清的研究工作要做。

当下公认可靠的金文资料既如此，对于古文献中的历日资料就更须小心处理。《汉书·律历志》所存录的《世经》中引有古文《尚书·武成篇》的部分文字，工程评价甚高。《报告》说：“该文与《逸周书·世俘》所记除个别文字歧异，几乎全同，学术界多认为《世俘》即《武成》。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指出，《世俘》‘除文字体例当属周初以外，其中所记社会情形与习尚多与卜辞及古金中所载者相合’，‘必非后人伪托’，‘最为可信’。文中涉及伐商前后的月份、干支、月相，与《召诰》、《洛诰》、《顾命》、《毕命》记载有周公营洛、反政以及成王临终等大事的月日干支及月相等前后呼应，是公认的检验克商年的主要依据。”^[5]（第45页）这话看似有理而其实不妥。首先是古文篇的史料价值是一回事，所记历日是否可靠又是另一回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其次，即使承认这类文字反映了商周之际的社会情形和习尚，甚至保存了当时的一些遗文断简，也并非是说现存的篇章都成于周初。《报告》以《武成》历日置于所作历谱之首，可见是相信这些历日流传最早而且是可谱、合谱的。然如顾颉刚先生所说：“这是一篇断烂的文章，错简、脱字、误字不知凡几。”^[17]将这类材料与第一手的金文资料同等看待是不慎重的，将二者编排在一起而总称“西周金文历谱”也不妥当。

《世经》存录的《武成》文字片断，合起来如下：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

今存《世俘篇》的内容甚为繁复，而有大致相同的文句：

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周，征伐商王紂。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紂。……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周庙。



二者文字上的差异,主要在首句的历日。别本《世俘》或“丙午”作“丙辰”、“丁未”作“丁巳”,有学者又欲改作“壬辰”、“癸巳”,以求与《武成》之文相合,这是不可以的,也不必要。不过《武成》的“来三月”,从《世经》的解释看,可能原作“来二月”,与《世俘》同,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四已指出其讹。大约《汉书·律历志》转录《世经》时传抄有误,或后来传抄者手误。

《世经》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刘歆)据《武成》及其他文献试图复原的武王克商历日如下(下录皆用周正,岁首早于殷正约一个月):

十二月	戊子	二十八日	周师初发
正月	辛卯	朔日	
	壬辰	二日	旁死霸
	癸巳	三日	武王步自周
	丙午	十六日	武王逮师
	戊午	二十八日	周师渡孟津
	己未	二十九日	冬至
二月	庚申	朔日	既死霸
	癸亥	四日	周师至牧野,夜阵
	甲子	五日	昧爽合阵
	己丑	晦日	大寒中
闰二月	庚寅	朔日	
	戊午	晦日	
三月	庚申	二日	惊蛰
四月	己丑	朔日	死霸
	甲辰	十六日	望
	乙巳	十七日	旁生霸
	庚戌	二十二日	既旁生霸

看这个历日表就可以知道:(1)它是用《三统历》推排得来的,合乎以平朔为月首的历法体制;(2)岁首用周正,以殷历的十二月辛卯为正月朔日;(3)设置闰月,以协调文献所见各月的历日干支;(4)推排结果合乎《三统历》的节气次序;(5)对月相词语有特定的理解,即以“霸”指月亮的无光面,“死霸”为朔,“生霸”为望,“旁死霸”为朔后一日,“旁生霸”为望后一日;(6)将《世俘》所记武王“步自周”的丙午日改为武王“逮师”之日,而将武王“步自周”上提到当月癸巳日,且更以上月戊子日为周师初发之日——这显然是为了照顾“孟津去周九百里,师(日)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的传统说法。无须赘说,这些都决不是周初的实录,而只是汉人的推排。

由于干支纪日是个循环重复的系统,所以同样的历日材料可以有不同的编排。王国维先生曾就《世经》批评说:“由旧说推之,既以一月二日为壬辰,二月五日为甲子,则四月中不得有庚戌。史迁盖不得其说,于是移武王伐纣于十二月,移甲子诛纣于正月。(原注:今《史记·周本纪》作‘二月甲子昧爽’。徐广曰:二月,‘一作正’。)刘歆不得其说,于是于二月后置闰。然商时置闰皆在岁末,故殷虚卜辞屡云十三月,武王伐纣之时,不容遽改闰法。此于制度上不可通者,不独以既死霸为朔,旁死霸为二日,既旁生霸为十七日,为名之不正而已。若用今说,则一月戊辰朔,二十五日壬辰旁死霸,次日得癸巳,此武王伐纣兴师之日也。二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既死霸,越五日至二十七日得甲子,是咸刘商王纣之日也。三月丁卯朔,四月丁酉朔,十日丙午既旁生霸,十四日得庚戌,是武王燎于周庙之日也。于是《武成》诸日月,不待改月置闰而可通。”^[18](第24-25页)这样的编排,如果脱离了某种固定的历法,又不确知历史事件发生在哪一年,那么总是会有法子可想的。但是反过来,用这种编排去推求历史年代,又同样会碰到纪日干支循环往复的困难。工程的历谱依据科学测定的合朔表,以《武成》的“一月壬辰旁死霸”为正月二十日,“二月既死霸”为正月十八日,“粤五日甲子”为二十二日,“四月既旁生霸”为四月四日,“粤六日庚戌”为九日。这样做仍与古人的推排方法毫无二致,并不能消除其法内在的困难;而且又使“既死霸”跑到了“旁死霸”的前头,二者都侵入了工程所定“既望”的范围之内,于月相词语的解释更造成几分混乱。刘歆对月相词语的解释是不可靠的,



但尚能自圆；如果既有新的解释而不能自圆，那就无法赖以构建金文历谱。

问题仍回归到对于西周历法尚不能考明的一系列关键环节上。第一，假如周初的历法并非是以平朔为月首的朔望月体制，甚至有可能曾采取商未推行的“一甲十癸”之制，那么后人所有按朔望月体制编排的当时历谱便都失效；即便假定周初以“朏”为月首，其历日也不会与平朔之月都相同。第二，周初民间农历可能仍通行传统的夏正，并未有严格的建子或建丑的规定。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说，古本《竹书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此当出于古老的传统，未必仅限于三晋地区。商代建正问题，目前尚未有固定的说法，这种状况至少会持续到周初。“三正”之说后来被赋予相当浓厚的政治意义，且与表示岁星或太岁纪年位次的十二地支相配合，应该相当晚起。第三，周初金文多不用月相词语，有些大概也须从夏正的体制上考虑。如利簋铭文只记有甲子、辛未之日，不赘年份、月份，大约因当时武王纪元尚未有定，而武王克商的甲子日则尽人皆知，故不须详记，并非是什么“隆重的书法”。又如何尊铭文，从内容看必是成王五祀的记录，若无充足而令人惊奇的理由，绝难否定这一点，否则这一价值连城的断代标准器物将大为贬值。所录“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的事实，乍看似乎与今本《纪年》的“夏五月王至自奄”（又见《尚书·多方》）相矛盾，但后者或已转换为周正，只要把何尊的“四月丙戌”仍理解为夏正，则二者月份正相衔接，并无冲突。工程历谱的周初部分只用文献而不用金文，想来对西周历法的变化还关注不够，未能究明。第四，月相词语，金文常见者只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几个，另外则“初吉”一词使用特多；“生霸”、“死霸”而冠以“旁”（或“方”）字者，目前仅见于晋侯苏钟铭文，当出于西周晚期的习惯，而文献多有此类词语，且多赘以“粤（越）几日”之文，亦可见相关文献晚出。第五，还有商、周纪日干支的连续性问题，上面已经说过了，兹不重复。

考虑到各方面的理由，对于《武成》或《世俘》篇的历日是不可轻信的。武王克商的“甲子”之期今已无可怀疑，《尚书·牧誓》的记载由利簋的出土得证实；至于《武成篇》排谱式的历日记录，则当是由战国秦汉间人围绕这一日期，根据特定的历法推导出来的，不能都看作是周初遗文。当时学者有着相当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但并无金文资料基础，或偶见西周金文资料出土也不注意利用，所据惟传世文献。而文献中所见武王伐商历日莫详于《世经》，所引《武成》却又与今本《世俘篇》的历日有出入，这是不能不令人怀疑的。今本《逸周书》各篇的标题都有“解”字，如称“克殷解”、“世俘解”等，原先当是经师的讲章。经师解经务求其细，不厌其烦，于历日亦必杂采所见，或自为推排，故知其与当时金文不合。《武成篇》的来历不明，传说为“孔壁古文”，至今仍是悬案，“壁中书”的故事也只是到刘向、刘歆父子才提出（现在最早见于刘歆《移太常博士书》）。^[19]（第40-46页）今本《尚书·武成篇》照抄刘歆所引《武成》的首句，其下又谓“厥四月哉生明”、“越三日庚戌”，历来公认是伪作。

《泰誓篇》的历日“丙午王逮师”、“戊午王次于河朔”等为刘歆所引，而东汉学者亦已怀疑《泰誓》是晚出的伪品（见《尚书·泰誓上》孔疏引马融《书序》）。同样的历日，《武成》、《世俘》及《泰誓》用周正，《史记·周本纪》用夏正，《齐世家》又用殷正，且伐纣之年有武王十一年与十三年之别，参差若是，可知原材料的构筑最早不得超过战国中叶。其实不独《武成》、《世俘》如此，即《召诰》、《洛诰》、《毕命》等篇，公认是可靠的西周遗文者，其具体历日亦未可盲从。《孟子·尽心下》有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册而已矣。”对《尚书》中具体历日的运用，尤当慎之又慎。

商、周古历不可确知的障碍几乎难以逾越。近年王玉哲先生谈到：“用后世密率以追溯上古历数，即使确实合于往古天象，也未必尽合于当时周王所颁布、实行的有误差的朔策，这确实是今天研究古历者不能解决之难题。”因此他提议：“若想解决这个西周开始年代问题，必须放弃运用历法的途径，而改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主要的依据对象。其实西周开始年代在《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得很明确，……周幽王确死于公元前771年，‘二百五十七年’是指西周的总年数。771加上257为1028，那就是说武王灭商为公元前1028年。这样简单明了的问题，何必搞得那样复杂，使人人走入天算的迷宫，或者曲解史料，硬说‘灭殷’不是指克商，而是指周公还政成王（董作宾），或者纠缠在古文《武成》与《逸周书·世俘解》中的干支纪日校勘问题上（庄述祖、王念孙父子），以及争论至今尚未取得一致认识的分月法和月相名词的含义（从刘歆、孟康、许慎、马融至王国维、黄盛璋）。”^[20]（第510页）这个提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成快刀斩乱麻之效，也有助于走出古史年代学研究的误区。



参考文献:

- [1]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2]陈梦家. 西周铜器断代[M]. 北京:中华书局, 2004.
- [3]陈梦家. 西周年代考重编前言[A]. 尚书通论外二种[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408.
- [4]岑仲勉. 两周文史论丛[M]. 北京:中华书局, 2004.
- [5]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R].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0.
- [6]何炳棣, 刘雨. 怀疑真古, 相信假古——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A]. 古史考第九卷[C].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3.
- [7]周言. 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年代献疑[A]. 古史考第九卷[C].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 120.
- [8]张富祥. 《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较研究[J]. 史学月刊, 2006, (1): 20-28.
- [9]李学勤. 夏商周年代学札记[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
- [10]常玉芝. 百年来的商殷历法研究[A]. 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11]刘朝阳. 再论殷历[J]. 燕京学报, 1933, (13).
- [12]胡厚宣. “一甲十癸”辨[A]. 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262-264.
- [13]肖良琼. 刘朝阳与殷商历法研究[A]. 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66.
- [14]陈梦家. 殷虚卜辞综述[M].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15]成家彻郎. 读《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A]. 古史考第九卷[C].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 98.
- [16]蒋祖棣. 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A]. 古史考第九卷[C].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 80-82.
- [17]顾颉刚. 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J]. 文史, 1963, (2).
- [18]王国维. 观堂集林[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 [19]陈梦家. 尚书通论[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20]王玉哲. 中华远古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陈 峰)